

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核心要义与中国实践^{*}

□ 李 丹 李龙龙

〔提 要〕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着眼于百年变局下全球发展的矛盾困境，回应了弥合南北发展鸿沟的时代呼声，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蕴含着深刻的理念内涵：在建设原则上，坚持发展优先、以人为本、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在建设目标上，致力于加快全球减贫进程、推进全球发展治理、促进全球均衡发展，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包容性；在建设路径上，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凝聚发展合力，推动构建主体平等参与、成果共同分享的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与各国携手实现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中国作为首倡国，正致力于以新型经济全球化引领全球发展方向，以绿色低碳合作创新全球发展方式，以共建“一带一路”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以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激活全球发展动力，以“鱼渔并授”创新全球发展援助范式，以实际行动推动建设全球发展共同体。

〔关 键 词〕全球发展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李 丹，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李龙龙，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4) 4 期 0005-32

^{*} 本文系厦门市社会科学调研课题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2024B01）、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FJ2024MGCA04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批准号：17JZD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全球发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提出了全球发展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中国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方案、方法，对于引领全球发展方向、指导中国参与全球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深入探讨全球发展共同体理念的形成背景、核心要义，系统总结中国的实践贡献，有助于深入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意蕴和重大价值，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新格局。

一、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提出背景

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基础，着眼于破解全球发展赤字共同需要，既是弥合南北发展鸿沟的必然需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要求。

（一）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是破解全球发展赤字的共同需要

2015 年 9 月，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一致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涵盖经济、社会、生态等三个方面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截至 2023 年底，仅有 17% 的目标取得进展，近一半目标收效甚微，超过三分之一的目标停滞甚至倒退。^[1] 全球发展赤字日渐显著。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2023 年，全球货物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均下降了 2%，流向可持续投资基金的新资金下降了 60%。^[2] 贸易和投资萎缩

[1]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4,” United Nations,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4/>.

[2] M. Ayhan Kose and Alen Mulabdic, “Global Trade Has Nearly Flatlined. Populism Is Taking a Toll on Growth,” February 22, 2024, <https://blogs.worldbank.org/en/voices/global-trade-has-nearly-flatlined-populism-taking-toll-growth>;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4,”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24_en.pdf.

再加上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人口老龄化、世纪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推动过去三十年进步和繁荣的所有经济力量几乎都在消退”。^[1]2015年至2023年，全球GDP平均增长率维持在2.7%左右，人均GDP增长率约为1.7%；最不发达国家（LDC）GDP年均增长率约为3.5%，人均GDP增长率约为1.1%。^[2]这些数值均低于SDGs设定的7%最低增长目标。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当前至2030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可能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世界经济论坛研究报告认为，多数国家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且缺乏包容性，“既难以吸收或催生创新成果，也难以减少全球冲击带来的影响”。^[3]

第二，全球发展合作面临挑战。首先，地缘经济碎片化严重撕裂了全球发展合作共识。2020年至今，全球平均每年签署的贸易协定仅有5项，不足2000至2010年间每年平均水平的一半。仅2023年一年，全球就出台了近3000项贸易限制措施，约为2015年的5倍。^[4]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正在脱离世贸组织的世界，回归关贸总协定的世界。^[5]其次，西方大国自私内顾和保护主义倾向更加严重，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能力和意愿进一步下降。有条件援助是二战后西方促进国际发展的主要手段，但发达国家长期未能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占国民总收入（GNI）0.7%的官方发展援助（ODA）目标也正在被逐步淡化。最后，国际发展领域的大国竞争日趋激烈。

[1] “Global Economy’s ‘Speed Limit’ Set to Fall to Three-Decade Low,” March 27, 2023,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3/03/27/global-economy-s-speed-limit-set-to-fall-to-three-decade-low>.

[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经济发展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3] “The Future of Growth Report 2024,”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024,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Future_of_Growth_Report_2024.pdf.

[4] Gita Gopinath, “Cold War II? Preserv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Amid 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ecember 11, 2023,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3/12/11/sp121123-cold-war-ii-preserving-economic-cooperation-amid-geoeconomic-fragmentation>.

[5] Enda Curran and Alberto Nardelli, “A New Trade War Offers No Easy Way Back for Old Global Order,” Bloomberg, May 23, 2024,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05-23/a-new-trade-war-offers-no-easy-way-back-for-old-global-order>.

“随着发展问题的边界不断外扩，国际发展正在从大国博弈边缘走入核心，援助的工具化、泛安全化甚至武器化趋势加剧”^[1]，全球发展的合作属性被严重削弱。

第三，人类可持续发展进程受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不合理发展方式导致的气候变化、卫生健康、资源能源、环境污染等问题成为关乎全人类存续的议题。以气候变化为例，到 203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比 2019 年减少 50%，才能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全球气温升幅不超过 1.5℃ 目标。但按照当前各国自主贡献方案的减排承诺，该目标只能完成 11%。^[2]2023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温室气体水平、地表温度、南极海洋冰盖和冰川退缩等方面的纪录均被打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立即行动，为人类和地球筑起最后的生命线。^[3]世界经济论坛《2024 年全球风险报告》更是将气候危机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视为未来两年内影响世界的第二大风险，并预测其将在十年内成为全球发展的第一大风险。^[4]世界气象组织研究报告也认为，“气候变化会影响几乎所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5]

（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是弥合南北发展鸿沟的必然需求

南北发展鸿沟是全球发展领域面临的另一大顽疾，严重背离了公平公正的发展原则，不仅表现在现实层面的差距拉大、权利失衡，还表现在观念层面缺乏共识。

[1] 姚帅、杨冬婉：《多重危机背景下的全球发展合作：形势与趋势》，《国际经济合作》2023 年第 2 期，第 45 页。

[2] Simon Black and Ian W.H. Parry, “Is the Paris Agreement Working? A Stocktake of Global Climate Mitigat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ovember 21, 2023,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CLNEA2023002.pdf.

[3] 《来自地球的“求救信号”：2023 年气候变化指标达“爆表”水平》，联合国新闻网，2024 年 3 月 19 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03/1127461>。

[4] “Global Risks Report 2024,” World Bank Group,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Global_Risks_Report_2024.pdf.

[5] “Climate Change Undermines Nearly Al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https://wmo.int/media/news/climate-change-undermines-nearly-all-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第一，全球贫富差距拉大。首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缩小趋势放缓。21 世纪前 20 年中，发展中国家年均经济增速约为 5.72%，远高于发达国家 1.97% 的水平，出现了经济学中所描述的经济趋同现象。但从 2020 年开始，发展中国家年均经济增速下降到了 2.83%。^[1] 世界银行 2024 年 4 月的研究报告显示，有资格获得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IDA）赠款和无息或低息贷款的 75 个国家中，有一半与最富裕经济体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这在新世纪尚属首次。^[2] 其次，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扩大。1995 至 2021 年间，全球最富裕的 1% 人获取了 38% 的增量财富，50% 的底层民众只得到了 2%。^[3] 乐施会 2024 年的研究表明，全球收入不平等 25 年来首次加剧，主要体现在南北之间的收入不平等。^[4] 另外，发达国家内部出现诸如“铁锈地带”的底层白人等大量被全球化发展所“遗弃”之人。美国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ć）的研究表明，1990 年以来全球实际人均收入的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前 1% 甚至前 0.01% 的巨富人群以及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收益最少。^[5] 由此导致的中产阶级萎缩、族群矛盾激化、民粹主义蜂起，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造成了严峻挑战，并不断外溢至全球治理领域，引发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反全球化等逆流。最后，南方国家群体内部发展分化势头上升。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地位不断增强。然而，“隐身于‘实力南方’背后的‘贫穷南方’

[1]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全球发展报告 2023：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全球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4 页。

[2] Tommy Chimes and Bram Gootjes, “The Great Reversal: Prospects, Risks, and Policie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ountries,” World Bank Group,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6161dce8-521a-4722-9746-0231865fc8d1/content>.

[3]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2,” World Inequality Lab, December 14, 2021, https://wir2022.wid.world/www-site/uploads/2022/01/Summary_WorldInequalityReport2022_English.pdf.

[4] “Inequality Inc.,” Oxfam International, January 15, 2024, <https://oi-files-d8-prod.s3.eu-west-2.amazonaws.com/s3fs-public/2024-01/Davos%202024%20Report-%20English.pdf>.

[5] Branko Milanović,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0-44.

更像是“沉默的大多数”^[1]”，“这些‘贫穷南方’国家不仅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南北鸿沟’巨大，与一些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间的‘南南’差距也在扩大”。^[1]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已经具有高度或中度人类发展指数，但超过一半的LDC仍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之下。

第二，南北发展权利失衡。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明确将发展权认定为不可剥夺的人权。中国也认为，“实现发展权既是各国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2]现阶段，南方国家正当发展权益正在不断被损害。在生产领域，南方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发达国家牢牢把控着产业链顶端，攫取了全球价值链中的最大利润。南方国家大多处于国际分工链条末端，“低端锁定陷阱”使之难以摆脱低收入困境。在贸易领域，不仅长期存在着不合理的“剪刀差”，而且作为世界贸易组织重要基石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近年不断遭到质疑和否定。2020年2月，美国宣布取消包括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在内的25个经济体在WTO中的“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并于2023年6月正式通过了所谓的“结束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严重违背了WTO精神和原则，损害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在金融领域，“一个过时、失效且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架构，正在不断加剧不平等等问题”^[3]，发展中国家的领导权、代表权、话语权长期缺失，获取发展融资的机会严重不足。2021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出了最大规模的特别提款权（SDR）普遍分配方案。新增的6500亿美元SDR中，富裕国家获取了约4000亿美元，低收入国家只得到了约210亿美元。^[4]

发达国家随意分配并肆意侵占发展资源，挤压了全球南方发展空间。在

[1] 项昊宇：《“贫穷南方”不应成为失落的大多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2023年11月10日，https://www.ciiis.org.cn/yjcg/sspl/202311/t20231110_9114.html。

[2] 国务院办公厅：《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日，第1版。

[3] 《古特雷斯参加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联合国新闻网，2023年6月22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3/06/1119077>。

[4] 曲俊澎：《特别提款权不应成获益“特权”》，《经济日报》2021年4月15日，第9版。

发展援助对象选择上,发达国家重点关注与其经济政治利益直接相关的地区。美国将其大部分援助投入到了“第四点计划”国家,日本着力经营东南亚,英法主要关注非洲、印度等前属殖民地国家。LDC 得到的援助仅占援助国 GNI 的 0.09%,远未达到联合国设定的 0.15%至 0.20%目标。新冠疫情期间,七国集团在削减发展资金投入的同时,还从国际金融机构获得了总计相当于 2800 亿美元的资金,LDC 同期只获得了约 80 亿美元。^[1]

第三,南北发展理念冲突。二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实践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的国际干预上。在西方话语中,“世界上存在着‘发达’和‘欠发达’的社会,前者在北方而后者在南方,后者问题的解决受益于前者的知识”^[2]。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西方发展理念,漠视其他国家的实际发展诉求,构建的是一种等级和从属关系,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消除贫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是通过发展援助掌控受援国,使之继续依附于西方、确保西方从中渔利。随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广大发展中国家从“被动发展”的帮扶对象,跃升为了“主动发展”的主体,积极要求加快执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改革国际金融机构,革除国际发展体系中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问题和家长式作风。“以南北分立为基础的发展知识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发展治理主体彼此失去信任,发展议题被不断边缘化,传统发展共同体正在不断消解”。^[3]因此,以全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塑发展共识,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取代自私、傲慢、伪善、丑陋的美式援助理念^[4],以主体平等、民生优先、自主发展、普惠包容理念

[1] 《联合国秘书长:IMF 和世行“该改革了”》,新华网,2023 年 6 月 18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3-06/18/c_1212231900.htm。

[2] 崔文星、叶江:《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国际展望》2022 年第 1 期,第 92 页。

[3] 徐秀丽、李小云:《发展知识重建与全球发展的愿景》,《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 年 10 月 19 日,第 7 版。

[4] 《美国对外援助的伪善本质和事实真相》,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网站,2024 年 4 月 19 日,https://www.caitec.org.cn/n6/sy_xsyj_yjbg/json/6644.html。

超越西方中心、民主至上、干预发展、赢者通吃逻辑势在必行。

（三）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实现共同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心使命。习近平强调，“我们不仅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世界人民谋幸福，不仅追求自身发展，也致力于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这就是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1] 全球发展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15 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讲话中，深刻阐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意蕴——“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我们要将承诺变为行动，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2] 2017 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说中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括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并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3]

第一，平安的世界需要和平发展为保障。从本质属性看，发展就是和平发展。和平与发展、繁荣与安全是辩证统一、密切联系的一体。发展安全越来越成为发展内涵的一个方面、安全外延的一个类型，“发展政策安全化”趋势越来越显著。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将“免于匮乏的自由”和“摆脱恐惧的自由”定义为实现人类安全的核心要素。^[4] 习近平也多次强调贫困是动荡的根源，和平是发展的保障：“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5]。地区冲突以及国家内部纷争的总根源，仍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争夺与权力博弈。

[1] 《习近平出席武契奇总统饯行话别》，《人民日报》2024 年 5 月 10 日，第 2 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24 页。

[3] 同上，第 542 页。

[4]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New Dimensions of Human Security*,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

[5]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75 页。

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从“落后—动荡—落后”怪圈中走出来必须靠发展。将发展逻辑嵌入国家安全之中，才能建立“发展—稳定—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二，繁荣的世界需要合作发展为支撑。从发展方式看，合作才能带来发展繁荣。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一国自身发展不仅需要以他国发展为条件，更需要借助国际社会发展繁荣提供的机遇。因此，“单一国家的自主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从自主发展到共同进步的转变至关重要”，“共同进步意味着合作与共享”。^[1]21 世纪是合作的世纪，“合作是实现利益唯一正确选择”^[2]，“只要各国有合作的愿望、协调的行动，天堑可以变通途，‘陆锁国’可以变成‘陆联国’，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3]。以经济发展合作为例，在国际分工高度复杂的今天，很多产品尤其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必须依赖国际产业链合作。在合作过程中，资金、技术、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资料在全球合理配置和自由流动，形成互惠互利、共赢共生的利益链条，为全球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夯实物质基础。鉴于此，习近平倡导各国“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4]。

第三，包容的世界需要开放发展为依托。从结构特征看，包容发展意味着尊重差异、“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不排斥他国、不唯我独尊，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突出特性。从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将“包容”一词正式纳入世界经济增长框架，到习近平在 G20 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上明确提出“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发展”，中国在实践探索中不断丰富包容发展的内涵。建设具有包容性的世界，就是要“反对大小通吃、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自

[1] 张东刚、林尚立：《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经济日报》2024 年 10 月 18 日，第 11 版。

[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89 页。

[3] 《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3 年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54 页。

[4]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8 页。

己发展得好、生活得舒适，也要让别人同样发展得好、生活得舒适”。^[1] 习近平在 G20 工商峰会开幕演说中指出，“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2] 开放包容是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人类繁荣进步的基本条件，“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世界，能给各国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给人类带来更繁荣的未来”^[3]。

第四，美丽的世界需要可持续发展护航。从未来方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经济发展是现实要务，可持续发展是目标导向。可持续发展一要发展，二要绿色，绿色发展是谋求以最小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经济社会效益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可持续发展不是不要经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发展便没有未来。没有高水平发展为依托，不可能从根源上减少乱砍滥伐、竭泽而渔，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必定是无本之木。经济发展为生态环保提供物质支持，助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形成良性发展机制。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不同于粗放型发展。只要经济效益，发展不可持续，人类也没有未来。只有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发展模式，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相互转化，给人类期许一个美好未来。“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应该携手努力，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4] IMF 的研究表明，加快推进低碳转型，

[1] 《习近平：建设一个包容和谐的世界》，新华网，2018年4月1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11/c_1122668177.htm。

[2] 《习近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讲话选编》，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页。

[3] 习近平：《把握时代潮流 缔造光明未来——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6月23日，第2版。

[4] 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2年12月16日，第2版。

避免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其收益大于成本。^[1]2023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 0.5%，国内生产总值却同比增加了 5.2%，即为明证。

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核心要义

早在 2014 年 11 月，习近平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国伙伴对话会上，就提出“共建发展和命运共同体”的主张。2017 年 5 月，在论及“一带一路”建设的世界意义时，他又提出要“打造甘苦与共、命运相连的发展共同体”。^[2]2021 年 9 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正式提出“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此后，他多次在国际场合呼吁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推动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再出发……助力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3]，呼吁各方“坚定信心，众志成城，携手构建发展共同体，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4]，欢迎各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深化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发展筹资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让各国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5]。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一经提出即引起了巨大的国际反响，成为推动全球发展合作的中国方案。

[1] Jens Mehrhoff, “Benefits of Accelerating the Climate Transition Outweigh the Cost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Blog, December 5, 2023, <https://www.imf.org/en/Blogs/Articles/2023/12/05/benefits-of-accelerating-the-climate-transition-outweigh-the-costs>.

[2] 《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2 年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50 页。

[3] 习近平：《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 年 6 月 24 日，第 2 版。

[4] 习近平：《勠力同心 携手同行 迈向发展共同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8 月 25 日，第 2 版。

[5] 习近平：《坚守初心 团结合作 携手共促亚太高质量增长——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11 月 19 日，第 2 版。

（一）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原则

第一，发展优先原则。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要义是发展，全球发展倡议的第一条就是坚持发展优先。发展是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第一大关键词，这与西方执迷于“没有民主就没有发展”的理念形成了鲜明对照。西方国家将基于自身经验的“善治”凌驾于南方实际发展需求之上，以抽象的“人权”替代具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将发展困境片面归因于国内治理因素，并试图以援助为手段将对象国改造为其所希望的样子，其本质是一种“治理优于发展”的发展理念。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发展优先原则。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必须将发展置于全球议程的中心位置。在推进全球发展实践中，中国坚持“聚焦发展，改善民生”，“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需求，把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为发展合作的出发点”；^[1]“坚定不移支持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帮助各发展中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2]。

第二，以人为本原则。在全球发展语境中，“人民”是与“资本”“精英”对应的多数人。相比于新自由主义“见物不见人”“利润高于人民”的资本至上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既关注受国际资本剥削的发展中国家人民，也关切西方被资本家压榨的普通人。首先，“为了人民”是推进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目标。习近平始终从“一切为了人民”的崇高立场出发谋划全球发展事业；强调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3]；号召各国在发展过程中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其次，“依靠人民”是推进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动力。习近平把“依靠人民”视为全球发展事业的“源头活水”；认为“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4]最后，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11 日，第 14 版。

[2]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5 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76 页。

[4] 同上。

“人民共享”是推进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保障。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需要“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发展环境，创造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的发展局面”^[1]。正是秉持这样的“人民本位”发展观，习近平把“以人民为中心”确定为全球发展倡议的根本遵循，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普惠的新阶段。

第三，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的高度凝练，也是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提出，“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集众智、汇众力，动员全球资源，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发展。”^[2]“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通过的《哈瓦那宣言》也呼吁各方，“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致力于实现全球发展和共赢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在民族国家利益诉求多样化、差异化的世界中构建发展共同体，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摒弃中心论、优越论、优先论。共商是一个利益表达的过程，秉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4]的理念，鼓励各方围绕发展领域相关议题充分协商，集思广益，推进全球发展治理规则民主化。共建是共商理念的逻辑延续和实践体现，指的是各利益攸关方平等参与发展治理的各环节，“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双方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持之以恒加以推进”。^[5]“共享就是兼顾合作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使合作成果福及双方、惠泽各方。”^[6]共商是前提，共建是行动，共享是保障。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只有恪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476页。

[2]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13页。

[3] 《“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通过〈哈瓦那宣言〉》，《人民日报》2023年9月18日，第2版。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0页。

[5]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122页。

[6]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人民日报》2019年4月23日，第7版。

能尽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为众人所享。

第四，互利共赢原则。互利共赢是发展的动力之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 习近平反复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2] 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零和博弈只会制造更多的分裂、对立和乱局，互利共赢才能为合作提供持久动力。在全球发展的语境中，互利共赢指的是“将相关国家发展进程协同、联动起来，在助力发展中国家加快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南北各方实现普遍利益增值，形成水涨船高、各得其所的发展局面，实现各国共同发展”^[3]。互利共赢是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重要的价值坐标，也是全球发展事业行稳致远的长远保障。

“只有相互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做大共同利益蛋糕，走向共同繁荣。”^[4] 在推进全球发展共同体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互利是实现共赢的前提基础，共赢是互利合作的必然结果。“互利合作是符合各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阳光大道。”^[5]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将互利共赢称作是“合作法宝”。互利共赢原则要求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代之以多赢、双赢的新理念，在以增量利益带动存量利益的过程中使各方普遍受益。《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明确中国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发展合作时“恪守互利共赢原则，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时，重视和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需求，重义轻利、舍利取义”^[6]，将这一原则提升到义的高度。

（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目标

在擘画全球发展蓝图、推进全球发展伟业的进程中，习近平多次呼吁各

[1] 张宇燕：《构建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光明日报》2021年8月4日，第11版。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5页。

[3]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一带一路”发展学——全球共同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4]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215页。

[5] 习近平：《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9月6日，第3版。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国加强发展合作，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和“包容性”。这一重要论述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构建指明了目标方向。

第一，加快全球减贫进程，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在谈及全球增长前景时，习近平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让增长和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让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日子都一天天好起来”^[1]。为此，我们要“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和空间，支持世界经济真正公平发展”^[2]。消除极端贫困是实现全球公平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个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把消除贫困、获得“免于匮乏”的自由作为基本人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把“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确定为首要目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角度看，消除贫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本要求，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消除贫困的根本路径”^[3]。能否通过共同发展实现“天下共富”从而达到“天下大同”，是衡量“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4]建设情况和实现程度的最直接评判标准。习近平提出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5]；强调“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总钥匙”；并将减贫摆在全球发展倡议重点合作领域的首位，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消除全球贫困的迫切期待。

第二，推进全球发展治理，提升全球发展的有效性。全球治理最早就是针对发展问题的治理。1989年世界银行在讨论非洲的发展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概念。1992年，世界银行发布了题为“治理与发展”（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的年度报告。发展治

[1] 《习近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讲话选编》，第11页。

[2] 习近平：《登高望远 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日，第2版。

[3] 张伟玉、王志民：《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国际发展援助与减贫合作的模式创新》，《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115页。

[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23页。

[5]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262页。

理是将贫困、饥饿、落后、不公、不可持续等问题作为对象进行的治理。相对于提供物力财力资源的发展援助、聚焦改善主体关系的发展合作，发展治理直接针对问题本身，重视主体多元性、手段灵活性。但发展治理一直由西方主导，“西方化”“民主化”被视为发展治理前提，“自由化”“私有化”被奉为发展治理手段。当民主优先于民生、人权超越生存权、“善治”凌驾政府之上的观念大行其道时，发展治理早已本末倒置、走样变形，不仅“发展”背离了发展的初衷，“治理”也沦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就是针对西式发展治理弊病提出的全球发展治理方案。中国方案主张“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1] 中国主张将全球发展治理的重心放在治理贫困的病根上，并结合自身脱贫发展的经历，提炼出了“要想富先修路”“治贫先治愚”“男女平等奔小康”等鲜活管用的经验，尤其强调通过联动发展提升发展有效性。“互联互通是释放发展潜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联动发展的基础前提。”^[2] 以发展融资为例，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为前提，以提升发展中国家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注重发展导向和结果导向，主要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领域”^[3]，由此产生的联动发展效应，大大提升了减贫合作的有效性。

第三，促进全球均衡发展，提升全球发展的包容性。在发展学语境中，与包容性相对立的概念是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发展经验的排他性。“国际发展”“发展援助”“援助标准”这些概念无不是西方国家界定的。根据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的定义，官方发展援助包括由政府提供的用于经济发展的赠款和（赠予成分不低于 25% 的）优惠贷款。而诸如出口信贷和大型但优惠较少的基础设施投资等一些有效促进发展的方式却被排除在

[1] 《习近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讲话选编》，第 14 页。

[2]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262 页。

[3]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全球发展报告 2023：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全球发展》，第 393 页。

了 OECD-DAC 的官方发展援助定义之外。尽管 OECD-DAC 后来引入了“可持续发展官方支持总额”（TOSSD）概念，用以拓展狭隘 ODA 发展融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突出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援助领域里的特殊性，维持不平等的援助与受援关系”^[1]。排他性的发展理念和制度安排加速了全球发展治理的碎片化，由此衍生出的独享型发展成果分配模式，导致了国家和地区、阶层与群体之间发展差距拉大，全球发展不均衡性加剧。“实现世界均衡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另一批国家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2] 只有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才能够为人类共同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习近平呼吁“团结就是力量，分裂没有出路”，“让团结代替分裂、合作代替对抗、包容代替排他”，推动更加包容、普惠、更加有韧性的全球发展。

（三）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路径

全球发展共同体致力于解决人类发展领域迫切的现实问题，需要各国充分参与发展治理与合作进程，深入开展对话，扩大利益交汇点，寻求最大公约数，为促进世界共同繁荣作出贡献。以全球发展倡议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各方共建权责分明的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进而实现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目标，是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第一，以全球发展倡议凝聚发展合力。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为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提出了“六大坚持”，从发展政策、发展价值、发展格局、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目标各个方面奠定了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方面，凝聚共促发展的国际共识，推动发展议题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以来，有 100 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表态支持，被写入了中国—东盟建立对

[1] 周弘等：《从“官方发展援助”到“可持续发展官方支持总额”：国际发展援助统计方法的变革》，《西亚非洲》2022 年第 4 期，第 21 页。

[2]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220 页。

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议、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峰会、中国—中亚峰会等多个国际多边会议的成果文件中，在全球凝聚起了“人人重视发展、各国共谋合作的政治共识”^[1]。另一方面，制定了共创繁荣的行动纲领，推动发展理念开花结果。在全球发展倡议“六个坚持”当中，“坚持行动导向”原则全面聚焦减贫脱贫、粮食安全、卫生健康、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多个领域，为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擘画了具体可行的路线蓝图。

第二，以平等参与构建责任共同体。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是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需要各方相向而行，积极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责任共同体指的是各行为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双边或多边机制协同开展发展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在责任共同体理念视域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展治理体系中不再是主体与客体、援助与被援助、“我们”与“他者”的关系，而是共同推动者、负责者、受益者的关系，要根据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和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公平分担共同但有区别的发展责任。首先，发达国家有义务援助发展中国家。全球发展鸿沟的产生有发展中国家政策选择和资源禀赋方面的因素，但根源是殖民体系与国际旧秩序。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国际经济体系“边缘”和“外围”地带，通过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原料、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在全球贸易中长期受到“剪刀差”盘剥，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又进一步遭到美元宰割，层层榨取后落入“贫困陷阱”中无法自拔。因此，发达国家应当在全球发展中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才能偿还自己的“历史欠账”。其次，发展中国家要联合自强创新南南合作模式。发展中国家是自身发展命运的主宰者，但大多数自身条件和发展能力有限，联合自强的重要作用就尤为凸显。

[1]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东道主嘉宾非正式对话会暨工作午宴》，《人民日报》2023 年 11 月 18 日，第 1 版。

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当“发挥好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机制的作用，建设好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金砖国家等合作平台，推动发展中国家区域组织开展对话交流，探讨建立南南合作新架构”^[1]。最后，发挥好联合国的统筹协调作用。联合国在发展治理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崇高威望，在协调南北议程、弥合南北分歧、缓和南北矛盾、推进“南方援助国—北方援助国—受援国”三方合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人类追求发展指出了方向、带来了激励、整合了资源”^[2]。因此，各方共同参与，共同担当，才能共创全球发展新格局。

第三，成果共同分享构建利益共同体。对共有利益的珍视和培育是共同体形成的逻辑起点，一切共同体本质上都是利益共同体。“在全球化发展和世界紧密的相互依存状态下，各国间和全球层面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逐渐成为使人类结成紧密共同体的内生动力。”^[3]在创造和维护共同利益的国际合作中缔结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百年变局之下，“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4]。“共享发展是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路径”^[5]，命运与共是“美好世界应有的样子”。习近平曾指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6]发展视域下的共享理念，“就是兼顾合作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45 页。

[2] 崔文星、黄梅波：《国际发展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57 页。

[3] 刘雪莲、夏海洋：《以共同利益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 年第 1 期，第 30 页。

[4] 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23 日，第 2 版。

[5] 《习近平向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致贺信》，《人民日报》2023 年 7 月 11 日，第 1 版。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540 页。

公约数，使合作成果福及双方、惠泽各方”。^[1]从共享发展的视角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创造一种将所有人都视为完全正当的共享全球发展主体，推动和保障具有真正‘共同性’的‘人类利益’的命运共同体”^[2]。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全球发展共同体建设就是中国与世界寻找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增长点，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的过程，其关键在于突破零和思维桎梏，塑造互惠互利的理念共识，形成共享共赢的分配结构，使各方利益高度融合。

第四，携手实现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3]，是“人类的共同梦想”，“现代化是梦想连接现实的必由之路”。^[4]从理念内涵看，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向度，是全球发展共同体的理论内核，也是世界现代化的目标追求。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实质，就是要帮助各国共同迈向“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5]。从现实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和新经验。涵盖 14 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实现现代化，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强大动力。中国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将不断催生新产业、新行业、新模式，为全球发展提供新动能。中国创造的扶贫减贫、修路致富、科技先行、以人为本、教育强国等一系列现代化经验，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化理论，拓展了实现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求与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凝聚发展共识，探索现代化新路，携手实现现

[1]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

[2] 徐占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经济日报》2023 年 3 月 30 日，第 10 版。

[3]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52 页。

[4] 习近平：《在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人民日报》2024 年 9 月 5 日，第 3 版。

[5] 《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3 年合订本），第 56 页。

代化，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1]

三、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中国实践

全球发展共同体理念为实现全人类共同繁荣提供了思路，为中国推动构建繁荣美好世界指明了道路。中国正在以下几个领域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

（一）以新型经济全球化引领全球发展方向

“资本流向全球、利润流向西方”的西式全球化弊病，导致世界贫富悬殊、南北差距扩大。近年来，西方国家在“本国优先”旗号下大力推行“退群”“脱钩”“断链”“建墙”“甩锅”等逆全球化政策，进一步损害了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益。鉴于此，中国积极主动作为，以新型经济全球化引领全球发展方向。

第一，推进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普惠原则意在“使发展既平衡又充分，推动形成有利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全球化，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繁荣”；包容就是“支持各国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携手开创全人类的共同发展”^[2]。“普惠包容的全球化目标，尤其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愿景也只有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路径来实现。”^[3]一方面，中国大力倡导多边金融机构民主化改革，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投票权、任职权和代表份额，提出 IMF 份额占比改革系统方案，推动世界银行贷款向发展中国家倾斜；支持 G20 发挥国际经济事务协商平台功能。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推动金砖机制、上合组织在扩员完善中发挥经济治理职能；努力提升

[1] 马汉智、于江：《论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国际观察》2024 年第 3 期，第 9 页。

[2] 王毅：《深入贯彻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求是》2024 年第 2 期，第 20 页。

[3] 刘飞涛：《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内涵、逻辑及时代意义》，《国际问题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27-28 页。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

第二，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1]，“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2]在国内层面，中国大力实施自贸区、自贸港战略引领制度型开放。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分批建成了 22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总结提炼了 349 项制度创新成果推广全国，累计开展 3500 余项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改革试点，涵盖沿海、内陆、沿边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进一步优化。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设立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国际层面，中国积极打造国际经贸合作新平台。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国际进口博览会、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为全球货物、服务、数字贸易提供了新平台，为“双循环”发展格局构建开辟了新路径。

第三，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脱钩断供大行其道，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直接原因。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坚定支持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努力破除各类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加入 WTO 二十余年来，中国积极履行承诺，大幅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和外商对华投资限制，关税总水平由 15.3% 降至目前的 7.3%，低于 9.8% 的入世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签署的自贸协定由 10 个增至 22 个，自贸伙伴由 18 个增至 29 个。2023 年 12 月，中国倡导的全球首个多边投资协定《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最终文本完成了法律校审，得到了包括非参加方在内超过 95% 世贸成

[1] 习近平：《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2 年 11 月 5 日，第 2 版。

[2]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525 页。

员的广泛支持，协定达成后将成为全球首个多边投资协定。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要求，中国制定出台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将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31条减至29条，全面取消了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以实际行动彰显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

（二）通过绿色低碳合作创新全球发展方式

可持续发展是各方的最大利益契合点和最佳合作切入点，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着力点。在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核心的生态治理理念引领下，中国正奋发有为推进绿色低碳国际合作，勇于探索创新全球发展方式。

第一，构建绿色发展合作机制。任何国际合作的理念原则和行动规划，都需要通过具体的机制平台才能落地实施。为了更加有效地推动全球绿色发展转型，中国组建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了“关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与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了50多份环保合作文件；与31个国家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发布了“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概念文件；与32个国家共建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成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建设了“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与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了“以竹代塑”倡议，为绿色发展国际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平台支撑。^[1]

第二，强化绿色合作金融支持。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政府出台政策、明确支持全面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国家。积极拓展绿色

[1]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全球发展倡议落实进展报告（2023）》，第23-25页；《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第122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3年1月19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1/19/content_5737923.htm。

金融国际合作空间,是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五大支柱”之一。在中国倡导下,绿色金融进入了 G20 财金议程,并于 2021 年升格为常设化的可持续金融工作组。2017 年,中国人民银行参与创建了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体系网络,聚焦环境和气候管理领域的金融支持。2019 年,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参与了欧盟发起的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推动私人资本投入绿色金融。在完善的政策体系引领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国还积极通过丝路基金、绿丝路基金、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优惠贷款,为沿线国家绿色发展合作提供金融支持。

第三,加强绿色发展国际合作。在绿色金融的财力支持下,中国依托已有的绿色发展合作机制,与世界各国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绿色发展合作。在气候治理领域,中国作为“减缓适应气候变化的力行者、联合国气候公约的维护者、南北气候政治冲突的调解者、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者、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引领者、‘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带头人”的角色担当^[1] 举世公认。截至 2023 年下半年,中国已投入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用于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 39 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 46 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了 70 余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举办了 52 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为 120 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约 2300 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并通过低碳示范区建设,以及气象卫星、光伏发电系统、新能源汽车、环境监测设备、清洁炉灶等技术和物资援助,提升相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2] 在新能源开发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跑者和快速大规模增长的主要驱动力”^[3]。过去十年间,中国可再生

[1] 李丹、罗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角色——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视角》,《新华文摘》网刊 2021 年第 21 期,第 5-10 页。

[2]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第 98 页。

[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Renewables 2023,”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96d66a8b-d502-476b-ba94-54ffda84cf72/Renewables_2023.pdf.

能源新增装机在全球占比年均超过 40%，生产了全球 70% 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场设备及其他关键部件，风电、光伏产品覆盖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核电、水电等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已经帮助发达国家每年减少约 5.7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每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 60% 和 80%。^[1] 中国企业还凭借技术优势和发展经验，积极通过 EPC、海外建厂、海外投资与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可再生资源国际合作。

（三）共建“一带一路”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之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必须坚定致力于全球伙伴关系与合作，以确保在我们的发展历程中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2] 在《21 世纪议程》《蒙特雷共识》《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我们希望的未来》等凝聚国际共识的文件中，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原则被各国认可，成为全球共识和行动框架。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77 国集团峰会等多个国际场合，都倡导强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2022 年 6 月，习近平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提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理念，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注入了新内涵。^[3] “一带一路”是践行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具体平台，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与合作伙伴共谋发展大计、共享发展机遇，努力将全球发展洼地托举为全球发展高地。

第一，深化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经过十年共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能源转型》，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4 年 8 月 29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8/content_6971115.htm；《绿色发展，中非合作拥有广阔未来》，人民网，2024 年 9 月 5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4/0905/c1002-40313872.html>；《向新向绿、开放合作——第三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观察》，新华网，2024 年 10 月 25 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41025/a108b794ded349aebd1afb734bb75408/c.html>。

[2] 《可持续发展目标 17：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globalpartnerships/>。

[3] 习近平：《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 年 6 月 25 日，第 2 期。

互通网络基本形成：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蒙内铁路、亚吉铁路等陆上联通项目，有力拉动了共建国家和地区经济纵深发展；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现代化港口项目顺利建成运营，“丝路海运”航线总量达到 132 条，通达 4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5 个港口；^[1] 中国已经与 104 个共建国签署了双边航空运输协定，与 57 个共建国实现了空中直航，“空中丝绸之路”覆盖范围持续拓展；^[2] 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连云港—霍尔果斯通道等国际多式联运大通道持续拓展，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多元立体格局正式建成。相关研究表明，基础设施状况能影响 92%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3] 通过“一带一路”平台，中国将产业、技术、资金、管理、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资源，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上的需求对接，为发展中国家以较低成本完善基础设施、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可能。

第二，推动南南减贫合作进程。十年来，“一带一路”实施了 3000 多个合作项目，创造了 42 万个工作岗位，带动 4000 万人摆脱贫困。共建“一带一路”还提升了沿线国际经贸与产业合作水平。“一带一路”缘起东亚，横贯欧亚大陆联通欧洲，衔接非洲、辐射拉美、延伸南太，形成了一个融汇东西、贯通南北、联通陆海的全球经贸大通道，为共建国打破地理障碍、贸易壁垒和市场阻隔创造了良好条件。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一带一路”交通走廊建成后，沿线经济体贸易增幅将在 2.8%~9.7% 之间，世界贸易增幅将在 1.7%~6.2% 之间，低收入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有望增加 7.6%。^[4] 麦肯锡公司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报告分别表明，中国在非洲企业 89% 和 85% 的雇员实现了本

[1] 新华社研究院：《八项行动奠定共建“一带一路”新十年良好开局》，新华网，2024 年 10 月 15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41015/2d50474d3b694b2cba23c6967f100d97/c.html>。

[2] 李可：《共建“一带一路”筑就对外开放新格局》，《国际商报》2024 年 7 月 10 日，第 1 版。

[3] University of Oxford-led Infrastructure Transition Research Consortium and UNOPS, “Infrastructure: Underpin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ctober 22, 2018, p.41.

[4] 米凯莱·鲁塔等：《“一带一路”经济学：交通走廊的机遇与风险》，世界银行集团网站，2019 年，<https://www.shihang.org/zh/topic/regional-integration/publication/belt-and-road-economics-opportunities-and-risks-of-transport-corridors>。

地化，有效带动了本地人口脱贫，增强了贫困人口应对粮食危机的能力。^[1]

第三，推动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指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指导全球发展合作的纲领性文件，与共建‘一带一路’高度契合。”^[2] 在实践中，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推进伙伴国家在全球贸易投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政策协调和务实合作，在落实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协同效应”^[3]。

（四）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激活全球发展动力

“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4]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缩小南北技术鸿沟，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融入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回归科技向善、增进人类福祉的本质，是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中国主动抓住数字化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不断为全球发展注入新动能。

第一，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已与 17 个国家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 18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5] 与 33 个国家建立了“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6] 涉及信息基础设施、数字供应链、智能制造、智慧城市、跨境电商等多个合作领域。中国电商网络已遍布全球五大洲所有规模化跨境

[1] 《提升“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水平，携手抵御粮食危机》，国合中心网站，2022 年 6 月 16 日，<https://www.icc.org.cn/publications/policies/128.html>。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携手合作，共享美好未来——“一带一路”倡议支持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报告》，<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lgw/202209/202209190442043.pdf>。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44-445 页。

[5] 李可：《数字经济赋能“一带一路”向新而行》，《国际商报》2024 年 7 月 18 日，第 1 版。

[6] 《商务部研究院发布〈“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 2024——开放创新打造合作新高地〉》，中国日报中文网，2024 年 9 月 26 日，<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409/26/WS66f55a3ca310b59111d9b755.html>。

电商平台，合作朋友圈不断扩大，与各方在推动电商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包容性增长方面相向而行，在对接伙伴国发展诉求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并日益呈现显著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特征，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同“做电商找中国”。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推动新型全球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和动力，以及推进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重要手段和载体。

第二，加强新质生产力领域合作。面对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困境和西方来势汹汹的贸易制裁、科技脱钩和产业断链，中国迫切需要由颠覆性技术造就的、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绿色、先进、优质生产力，才能突破自身发展瓶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超过 4400 家，算力规模位居全球第二，5G 技术网络遍及全世界。以此为基础整合资源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将不断催生新产业、新行业、新模式，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国际合作还“可以成为促进内循环与双循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提供新动能”^[1]。

第三，改善国际科技合作环境。良好的外部环境是科技创新与合作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提倡，“要顺应科技发展趋势，以更加积极姿态推动科技交流合作，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2] 中国鼓励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弘扬“科学无国界、惠及全人类”精神，倡导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合作理念，^[3] 反对科技霸权和科技脱钩，塑造国际科技合作新环境，与各国携手构建科技共同体。截至 2023 年 10 月，中国已经与 161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 117 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加入了 200 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试点设立了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鼓励和支持外籍科学家面向全球挑战的科学问题开

[1] 周玉渊：《新质生产力与全球南方》，《战略决策研究》2024 年第 4 期，第 19 页。

[2] 《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3 年合订本），第 80 页。

[3] 《国际科技合作倡议》，科技部网站，2023 年 11 月 7 日，https://www.most.gov.cn/kjbgz/202311/t20231107_188728.html。

展研究；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互动，推动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创新要素顺畅流动；支持各国科研人员开展联合研究开发，共同推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1]

（五）以“鱼渔并授”创新全球发展援助范式

国际发展援助已经走过了 70 多年的历程，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陷入了“越援越穷”的怪圈。西方援助无助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符合自身特点和需要的发展模式，外援难以转化为摆脱贫困的内生能力。中国倡导的“鱼渔并授”新型发展援助主张激活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内生性能力，以实现减贫发展目标。

一是创新“授之以鱼”的融资模式。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为 2702 亿元人民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2]在融资模式选择上，中国主张在用好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等优惠性质的资金流动的基础上，将优惠买方信贷、用于发展目的的股权投资（比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旗下的中非发展基金、中国进出口银行旗下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和商业贷款（比如大额无优惠基础设施贷款）等都纳入援助资金范畴，并因地制宜地开展“‘债转发展’，将援外与贸易、投资相结合，政府财政、社会基金、企业资金、国际融资相结合”^[3]。债务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滑入“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对此，习近平提出国际社会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通过缓债、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4]。

二是注重“授之以渔”的发展能力。中国十分重视将发展中国家资源优

[1] 严瑜：《科技开放合作，利于造福人类》，《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 年 6 月 28 日，第 1 版。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3] 罗照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推动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当代世界》2024 年第 9 期，第 6 页。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 469 页。

势转化为发展能力。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援助经验表明，单纯的物质和资金支援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丰富、资源禀赋不差，但资源优势始终未能转化为发展能力，更有甚者还陷入了“资源越丰富、发展越缓慢”的“资源诅咒”陷阱。鉴于此，中国强调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认为从资源攫取和农业等初级活动到制造业活动进而再到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是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减少贫困的关键，西方发展模式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和工业化，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试图追赶工业化国家但却流于失败。^[1] 习近平高度重视工业化能力提升在全球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把工业化合作设定为全球发展倡议的重点领域，呼吁二十国集团落实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倡议；主张“着力支持非洲破解基础设施滞后、人才不足、资金短缺三大发展瓶颈，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2]。有的学者将这种发展援助概括为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赋能式援助”^[3]，这是中国“授之以渔”的独具特色的援外方式。

三是助力南方国家的人才培养。70余年来，中国累计为180多个国家培养了40多万名技师人才，其中一半以上为科技人才，涵盖农业、教育、卫生、气变等17大领域。^[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为70多个国家培养了400多名硕士博士。共建“一带一路”十年间，中国在沿线120多个国家安排了2000多个援助项目，培训各领域人才10万余人，在亚非欧29个国家建立了33个培养职业技术人才的鲁班工坊，与发展中国家工程科技院联合发起了数字丝路“百校工程”计划，助力共建国数字化人才

[1] 参见林毅夫、王燕：《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

[2]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53页。

[3] 赵可金、蔡锐：《从开发式援助到赋能式援助——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范式变革研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第26页。

[4] 《国合平：援外培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2024年7月31日，<http://www.cidca.gov.cn/20240731/58820142591c4a378373f1232d1b420c/c.html>。

培养。^[1]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还承诺，将继续与非洲合作推进“未来非洲职业教育”计划，共建工程技术学院，建设10个“鲁班工坊”。重点面向非洲妇女和青年，提供6万个研修名额。^[2]

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不断扩大——近年来中国援助对象由110多个增加到了160多个国家^[3]，援助总量在合理范围内不断增加，援助手段和方式持续拓展优化，中国的国际发展援助事业产生了日益巨大的影响。中国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工程，已经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了6000多个民生项目^[4]，菌草、青蒿素、杂交水稻等援外项目已经形成了显著的“品牌效应”。中国独有的菌草技术，通过对外援助传播到了100多个国家，有效解决了当地民众尤其是妇女的就业问题，被誉为“幸福草”“致富草”；中国累计对外援助青蒿素药品数十亿人份，为30个国家援建疟疾防治中心，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有约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科摩罗更是实现了疟疾零死亡、发病人数下降90%以上的奇迹^[5]；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已经远播五大洲近70国，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中国对外援助的道义感召力不断增强，习近平提出的“要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6]，是对中国“鱼渔并授”创新全球发展援助范式的最好注脚。

[1] 罗照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推动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第7页；罗照辉：《持续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和援外事业》，《学习时报》2023年10月16日，第1版。

[2] 习近平：《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3]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第124页。

[4] 《国新办举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新闻发布会图文实录》，外交部网站，2023年9月26日，https://www.mfa.gov.cn/web/wjzbz_673089/zyjh_673099/202309/t20230926_11150772.shtml。

[5] 《王毅：青蒿素是中国以自身发展造福世界的成功故事》，外交部网站，2022年4月25日，https://www.mfa.gov.cn/web/wjzbz_673089/xghd_673097/202204/t20220425_10673450.shtml。

[6]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四、 结语

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着眼于全球发展的总体格局，立足于中国参与全球发展合作的历史和现实，展现全球发展领域的中国主张和话语，标志着全球南方在发展领域终于有了能够代表自身立场、观点与诉求的系统性方案。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理念和实践大大丰富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发展的理解认知，正本清源地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发展怎么看、怎么办的清晰答案。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发展命运决定着人类命运，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坚实基础支撑，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深刻把握全球发展形势，聚焦全球发展问题，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谋划全球发展思路，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保障，彰显了中国对全球发展事业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大视野、大胸怀、大担当。

【责任编辑：宁团辉】